

对两本中国小学英语教材的变化研究： 多模态社会符号学的比较分析

岳曦雯

电子科技大学 格拉斯哥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1

DOI: 10.12238/jief.v6i6.8221

[摘要] 本研究采用多模态社会符号学视角，对比分析两本典型义务教育英语教科书，研究依据再语境化的四大原则，探讨教材多模态发展。研究结果显示，在全球化和科技革新的推动下，现代教材日益依赖于多种表达模式，包括文字、颜色、图像和布局。这些元素不仅在新的教学模式中发挥核心作用，也体现了教育需求的多样化，突显了教育创新的重要性。本研究填补了中国英语教材多模态研究的空白，为教育创新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关键词] 多模态社会符号学，中国英语教材变化，教学设计变迁，再语境化，教育创新

Study of two Chines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modal social semiotics

Yue Xiwen

University of TC, Glasgow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611731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social semiotics, compares and analyzes two typical English textbook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multi-modal development of textbooks based on the four principles of recontextu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riven by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rn textbooks increasingly rely on a variety of expression patterns, including text, color, images and layout. These elements not only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new teaching model, but also reflec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need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fills the gap in Chinese English textbook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Multi-modal social semiotics, change of Chinese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change of teaching design, contextualizati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绪论

研究概述与目标

本研究采用多模态社会符号学视角，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两本典型的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科书，探讨教材设计的差异及技术革新，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英语教材多模态发展。本研究的核心纽带是多模态社会符号学、英语教科书与教学设计的变化。

研究原因

英语作为“实用工具”，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是最广泛教授的第二语言或外语 (Bayyurt, 2015)。Bezemer 和 Kress (2016) 强调，教科书设计者和教育者依赖文字、颜色、图像和布局等模态。教材设计的技术革新反映了教育内容的动态发展，激发了学生学习新语言的动力。

研究问题

1. 根据再语境化的四大原则，过去 20 年间中国小学英语教材的设计有哪些变化？

2. 教科书的变化如何实现教学法的变化？设计的差异如何从设计者的意图和学习者的教学特征上体现出来？

文献综述

多模态社会符号学的应用

尽管现有学术领域未曾全面探讨“多模态社会符号学”、“英语教材设计”与“教材变化”这三个核心关注点，本文首先回顾了在不同学术领域内应用多模态社会符号学的先行研究。例如，Selander (2008a) 描述了学习资源和环境设计的教育设计，而 Kress 和 Van Leeuwen (2001, 引用自 Selander, 2008a) 强调了设计在构建交流资源和社会互动

中的作用。Danielsson 和 Selander (2016) 在两本科学教材中进行了详细的教学设计分析,探讨了不同资源的使用和相互连接如何在教育中创造创意。

EFL 教材设计的研究

在英语作为外语 (EFL) 领域,教材设计的研究多从不同角度出发,例如性别表征、思维技能的体现及教材的系统评价。Aljuaythin (2018) 运用 Fairclough 三维模型分析了沙特阿拉伯小学英语教材中的性别表现,发现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 Igarria (2013) 则通过 Bloom 的认知领域分类来评估教材中的 WH-问题,关注低阶与高阶思维技能的培养。

教材变化的研究

关于教材变化的研究,Bezemer 和 Kress (2010) 的研究被视为该领域的代表作,他们检验了不同学科中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教材变化,并分析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多模态设计原则。他们的研究强调了图像增加反映了教学的变化,旨在通过增强学习者的参与度和能动性来赋能学习者。

研究差距

尽管前人在 EFL 教材设计为本研究提供支撑,但在多模态社会符号学方面,对文字、图像、布局和距离等其他符号资源的作用探讨不足。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多模态社会符号学理论,分析中国英语教材设计变化及其教育意义,以填补研究空白。

研究方法

理论框架

多模态社会符号学

Kress (2011) 指出,多模态社会符号学提供了研究意义构建和学习的丰富视角,包括知识结构和评价形式、教学中的社会关系及身份构建等。多模态性和社会符号学相互交织又保持独立。多模态性强调不同模式及其功能性,而社会符号学提供了符号创造、意义构建及文本的理论框架。

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来自两本中国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的 EFL 教科书:《PEP 小学英语学生用书 II (2003 年)》和《PEP 小学英语学生用书 II (2012 年)》。首先,均由 PEP 出版,其学习材料广泛应用于必修课程,设计受教育部监控。其次,每本书都是在新课程改革启动后出版,为教材设计和教育政策领域提供了有启发性见解。第三,这两本书的主题组织相似,有利于对比研究,并针对初学者,缩小研究范围,使研究更具体且具有教育意义。

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社会符号学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探讨教科书中不同模式如何共同传达设计者的意图。详细分析两本教科书在四个符号学原则(再语境化,包括选择、排列、前景化和框架)方面的设计差异,以展示教学差异是如何在符号学上构成的。

局限性和伦理问题

由于研究规模有限,仅对两本 EFL 教科书进行详细分析。其次,研究结果含主观观点,可能影响设计者和教育者的解释,

将客观地理解教材的多模态设计变化。

研究分析

书 1 —《PEP 小学英语学生用书 II (2003 年)》选段

A. 选择

字母、对话、词汇、意义和句子都被框架化,但教学方式不同。词汇意义通过书面文本呈现,加粗的英文单词用于听、读和说,其他单词仅用于听和说。第二单元中,“Let’ s do”用作指令,语气严格,显示教师的主导作用。

B. 排列

显著采用上下布局模式。例如,第五单元中“Let’ s talk”在顶部用于学习对话,“Let’ s practise”在底部用于练习。右页上,“Let’ s learn”在顶部,“Let’ s play”在底部。较小框架内,线性阅读路径明显,例如,“Let’ s talk”中,书面文本和图像从左到右排列,读者从左到右阅读对话。

C. 前景化

旧教材中,参与对话的卡通人物不突出,但数字和字母显眼。在每个部分,左上角的字母最显眼,以橙色加粗显示,尺寸较大。在“每单元单词”中,中文标题加粗且尺寸更大。

D. 框架

A 部分由三页构成。第二单元“Let’ s talk”活动展示了灰色和白色空间构建的“分离”,设计者用英文名字区分“Amy”和“Mom”,这种“分离”展示了英语对话,未创建引人入胜的学习环境。

EFL 教学设计的某些方面被框架化。设计者仅使用英文名字称呼人,专注英语国家文化习俗,反映了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的教学法。此外,图像缺乏连贯性,学生未主动参与对话场景,教师在知识传授中起主导作用。

书 2 —《PEP 小学英语学生用书 II (2012 年)》选段

A. 选择

以不同方式选择教学的字母、对话、词汇、意义和句子,提高学习者的听、读、写、说技能。例如,“每单元单词”通过卡通形象生动表达词汇意义,并有双语帮助理解。设计者用卡通猴子拿着两个气球表示“two”的意义,以学生为主导激发学习兴趣。

B. 排列

第六单元的第一课,“Just talk”在左页作为“已知信息”,“Just read and write”和“Let’ s chant”在右页作为“新信息”。在框架内,“Just talk”布局为中心-边缘,教师在中心作为“信息核”,周围人物提供对话背景。右页布局为上下模式,“Just read and write”在顶部作为主要活动,“Let’ s chant”在底部作为辅助活动。

C. 前景化

Lesson 17 “Just talk”对话中的卡通人物被前景化。两名在船上交流的男孩以大框架最显著,近距离镜头创造亲近感,设计者期待观众参与场景。此外,角度正面且与观众视线平行,显示他们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前景化方式有助于学生积极练习对话。相比之下,不参与对话的“叔叔”和“阿姨”以远距离镜头描绘,表情和手势清晰。补充元素如红

色塔和山也作为对话背景信息。

D. 框架

英语学习边界清晰建立,一个单元内的课堂或复习环节由两页展开。例如,第三单元的“Just talk”活动通过各种资源创造“连接”和“分离”。颜色模式构建对话者间的线条,每个卡通人物穿特定颜色衣服,便于学习者识别角色及其发言。组图中的成员通过空白空间标出,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差距展示家长整体和教师单一信息单位。发言通过特定数字和页面中间白线标出和分离。在内容选择中,设计者更关注本地文化,如包含中文问候语,反映了向多元文化交流的教学法演变。

结果讨论

设计差异

选择原则涉及哪些模态资源被选入框架及其方式 (Bezemer and Kress, 2016, p. 77)。在这两本书中,书2使用拟人化的卡通形象生动地表达词汇的意义,而书1仅通过中文翻译解释,重要单词用粗体标出。在书写模式上,书2使用代词“your”和“me”创造平等和参与的学习环境,而书1则显得更为严格和权威。书2还通过肢体语言或姿势展示字母形式,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排列原则关注“选入框架的符号实体将以什么顺序表示?”以及“将使用何种符号排列其组成元素?” (Bezemer and Kress, 2016, p. 77)。书2中,谈话活动在左页,阅读、写作和吟诵活动在右页;书1则是上下模式的线性排列。书2谈话活动布局是中心-边缘,而书1是左右线性模式。这些排列差异表明,书2采用了相对灵活的阅读路径,而书1则是固定的线性阅读路径,可能影响学习内容的管理方式。

前景化原则涉及哪些选定元素被前景化,与其他作为背景的元素形成对比 (Bezemer and Kress, 2016, p. 78)。书2中,参与对话的卡通人物被前景化,创造互动和参与的学习氛围。书1中,最显眼的是字母和单元首页的数字,通过颜色和排版前景化。旧书还使用肢体语言突出特定字母,形成不同的学习环境。这些前景化差异可能影响对学习设计中重要元素的理解。

框架原则涉及设计者如何使用各种符号资源进行意义构建。根据 Kress 和 Van Leeuwen (2006, p. 203),“元素或元素组要么彼此断开,标记出来,要么连接在一起。”书1中,话语通过页面中间的灰色和白色空间分离,但没有通过颜色模式清晰构建个体差异。书2中,每个人物都有独特颜色,框架表明差异和个体性。设计者在家长和教师之间的空白空间将他们区分开,形成沟通空间。书2的设计通过隐形框架线条产生了更强的连贯性和统一感,为英语初学者创造了更具参与性的学习环境。

符号资源的使用

书1中,卡通人物通过特定姿势展示字母的可视化形式。每个符号设备都有其潜力和局限,因此我们关注它们在符号构建中的协同作用,而不比较模态的优劣。没有文字,图像和姿势所呈现的信息可能有限;同样,没有卡通人物图像的生动表

达,学生可能难以带着激情记住学习内容。

不同符号设备在意义构建中的使用方式也不同。书2中,图像和面部表情的模态主要用于表示“每单元单词”中英文单词的意义。拟人化的卡通图像生动表达意义,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增强记忆。相比之下,在“每单元单词”中,英语单词意义仅通过中文解释,无带有生动表情的卡通图像。尽管学习者可以理解母语中的意义,但阅读词汇时可能感到枯燥。

结论

本研究通过多模态社会符号学研究发现,最新教材在设计上更强调学生的参与和互动,采用了更多的图像、颜色和布局模态,使学习环境更加生动有趣。相比之下,旧教材在设计上更注重知识的传递和教师的主导地位,学习路径较为固定,学生的自主性较低。

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小学 EFL 教材在过去二十年的演变轨迹,并为未来的教材设计提出了若干建议。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教育者、教材设计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促进中国 EFL 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多模态教学的各种可能性,并结合多种研究方法,以期教材设计和教学实践提供更科学和有效的指导。

参考文献

- [1] Aljuayth, W. (2018). 沙特阿拉伯英语教材中的性别表征: 批判话语分析方法。《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文学国际期刊》, 7 (5), 151-157
- [2] Bag, E., & Bayyurt, Y. (2015). 土耳其英语教材中的性别表征。在《学习材料中的性别表征》中 (页 70-91)。鲁特里奇出版社
- [3] Bezemer, J., & Kress, G. (2010). 文本变革: 教科书的符号学分析。《学习设计》, 3 (1-2): 10-29.
- [4] Bezemer, J., & Kress, G. (2016). 多模态、学习与交流: 社会符号学框架。纽约: 鲁特里奇出版社
- [5] Danielsson, K., & Selander, S. (2016). 阅读多模态文本以学习——培养多模态文学的模型。《学习设计》, 8 (1), 25-36.
- [6] Igbaria, A. K. (2013). EFL 教科书中 WH-问题的内容分析《国际教育研究》, 6 (7), 200-224.
- [7] Kress, G. R., & van Leeuwen, T. (2006). 阅读图像: 视觉设计的语法 (第二版)。伦敦&纽约: 鲁特里奇出版社
- [8] Kress, G. (2011). 话语分析与教育: 多模态社会符号学方法。《教育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导论》, 205.
- [9]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PEP 小学英语学生用书第二册, 第三年级。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0]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 PEP 小学英语学生用书第二册, 第三年级。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1] Selander, S. (2008a). 学习设计 - 理论视角。《学习设计》, 1 (1): 10-22.